

历史记忆、宗教意识与「民族」身份认同

——青海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

张中复¹

前言

就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及其社会文化呈现的主体事实而论，像是使用「黄土高原的回—穆斯林与伊斯兰」以及「青藏高原的藏族与藏传佛教」这种带有特定区隔意义的概念时，一般都不会引起太大的语意争议。然而，单靠这种二分法式的地缘性差异来界定、辨识西北地区回、藏人群的分布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是很难呈现出其本应具备的整体面貌及其多元性特色。事实上，青海安多（Amdo）藏区东部的海东地区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当地藏、回少数民族及其社会互动关系中所展现的文化—族群共生（cultural-ethnic symbiosis）情境，却在近代发展出不少在文化特点、族群属性与认同意识上处于「游移」性质的人群。其中分布在青海东部化隆、循化等地的「藏语穆斯林」（Tibetan-speaking Muslims）即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按此一「边缘性穆斯林族群」（The marginal Muslim ethnic groups）的特殊现象，不仅是穆斯林人群在藏区生存发展中的一个异例（anomaly），并且对于理解中国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确实能够提供出一个具有结合当代族群史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特色的观察事实。如果从当代族群溯源（ethnogenesis）²研究的观点看来，藏语穆斯林的观察研究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论述面向：一、无论是历史性（historicity）或历史记忆的展现内容，民族志中所显示的「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争议，都必须面对藏文化如何与穆斯林文化并存适应的事实；二、从西北苏非主义教团（Sufism Orders）虎夫耶系统的花寺门宦太爷（教主）马来迟于清乾隆年间至海东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传说开始，经过格底目、苏非主义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当地宗教意识的变迁意义及其对于穆斯林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形塑过程；三、当代大陆民族识别下，「回族」与「藏族」的法定少数民族身份，对于藏语穆斯林的族群认同意识的巩固，及其所引发的族群边缘研究意义的讨论。透过这三种族群溯源观点下的研究途径，本文希望藉由藏语穆斯林的例子，不但能理解回—穆斯林族群与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发展适应过程中的多元性事实，同时亦有助于扩大并深化当代西北族群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以更为宽广与多样性的民族志与族群关系角度来观察藏语穆斯林现象，并且使之成为理解安多藏区回、藏族群关系的重要参考，同时也对于近年来逐渐敏感的青海民族问题提出有意义的观察视野，则是本文最主要的论述目的。

一、安多藏區多語情境中的藏語穆斯林現象

¹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 本文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在2012年六月所主办之「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由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教授筹组之「中国的边疆与域外」讨论组中。在此很感谢王明珂教授提供此一难得的发表机会。本文作者曾于2010年三月底至四月初，至青海东部化隆与循化等地进行卡力岗山区的田野研究。期间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马成俊院长提供必要的协助，并全程陪同完成调研，在此特别致谢。

² 以 ethnogenesis 观点来研究中国回—穆斯林人群祖源多样性特征及其当代族群属性，就现有西方的论述而言，其学科取向似乎是以人类学为主，而较不倾向于历史学意义下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这种取向，偏重族群性（ethnicity）、历史记忆以及当代族群身份属性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参看：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9, 80; *Dislocation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59-165; “Clashed Civilization? Musli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the PRC”. In Dru C.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1-124.



一般在讨论到近代安多藏区（包括甘肃南部）的少数民族的议题，尤其是涉及到「具有代表性的在地民族」这个概念时，「藏族」的重要性似乎是凌驾在「回—穆斯林」之上的。事实上，若是从更为多样性的族群关系的角度看来，这两大族群及其文化所分别代表的各种人文社会现象，一直是在多元互动的面貌中，共同形成青海族群图像中的主干部份。其中，该省东部的海东地区，其自然环境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区域，其人文社会环境更是界于安多藏区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交会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伊斯兰与藏传佛教的宗教本质差异甚大，但若从生态环境、人群分布与社会文化发展等面向看来，该地区回—穆斯林、藏族两种人文现象并未呈现出壁垒分明式的存在事实，而是以交错杂揉的互动并存模式予以展现。因此，海东地区内部复杂的族群互动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族群认同、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等过程，往往会让当地的回—穆斯林与藏族之间出现不同意义下的族群边界的多样性内涵。而本文所要探讨的藏语穆斯林正是这类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一般所谓的藏语穆斯林，主要指的是分布在海东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及其邻近地区中一支说藏语的穆斯林人群。由于较为集中在该县德恒隆、沙连堡、阿努什等三个乡所在的卡力岗（Kaligang）山区，因此学界也有将之称为卡力岗现象。当地地处海拔平均两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带，对外交通联系不便，土地贫瘠与久旱不雨的缺水现象成为影响当地农、牧业生计的最主要因素。此种艰困的生态环境造成社会发展的封闭性，也明显塑造出卡力岗山区特有的人文现象。至于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人口总数的说法不一，有数千至数万人不等的说法。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背景，一方面涉及到当地穆斯林「说藏语」的程度在生活形态中所代表的族群、文化现象的多样性特征，与当代大陆政府民族政策中所界定出「回」与「藏」这两个民族的法定身份之间，往往会出现内部认同与外部认定未必吻合的事实。另一方面，除了化隆境内卡力岗山区之外，邻近的循化县境内的撒拉族中也有「说藏语」人群的存在事实，这些现象都使得学界对于藏语穆斯林的身份、族属界定出现不少争议。当然，这其中也牵涉到如何以较为具有说服性的研究概念与方法来研究卡力岗现象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表征性的文化特质在卡力岗现象的族群归属的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以单纯的族群文化模式对于卡力岗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有着难以避免的困难。¹的确，尤其是对中国「回」、「藏」族群文化的表象及其互动意义仍抱着传统刻板印象式的认知，就来观察历史上与当代卡力岗现象的话，其结论一定会产生更多的争议。

一般而言，说汉语的回—穆斯林在中国分布的地理空间十分广袤，他们与其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经验与互动现象都相当密切。尤其是多民族地区在特殊的历史性与空间性的条件下，以及像是经营商贸关系发展的必要性等事实，使得回—穆斯林的语言使用情境往往呈现出「多语」特殊适应模式。其中甘肃的西道堂教派在藏区长期从事商业买卖，因此不少教众都能使用流利的藏语，这是较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但也有一般人难以知悉的案例，像青海海南州尖扎县的部份住在康扬乡的回—穆斯林至今还能使用与蒙古语言关系十分密切的土族语。²事实上，这种「多语」的特殊适应模式及其现象，基本上只是语言使用的层次与选择的多样性，其并未涉及回—穆斯林本身的族群认同、族群边界或是族群溯源等有关于族属认定的问题或争议。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卡力岗现象，其重点并不是在于单纯的语言使用问题，而是在于这群藏语穆斯林在族群溯源的研究观点下，其祖源有可能是非穆斯林的藏族，其后因为改宗伊斯兰教信仰成为穆斯林，但在文化特征中又完全没有放弃藏文化的前提下（主要是说藏语），形成「回」与「藏」两种文化属性同时兼具的特殊群体。事实上，类似的穆斯林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同时在族属身份上出现族群边界的认同多样性的情况，在中国其他多民族地区中也有相关的案例，像是青海、新疆境

¹ 马海云、高桥健太郎，〈伊斯兰教在藏区：卡日刚穆斯林研究〉，收入：中国回族学会编，《回族学与21世纪中国》，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299、291-312。

² 吴承义，〈康杨回族乡沙里木回族讲土语及其由来的调查报告〉，《青海民族研究》，1990（4），页50-54。

内说蒙古语的「托茂人」、内蒙古西部的「蒙古回回」、云南的「白回」、「傣回」与「彝回」等。这些人群与「藏回」(Tibetan-Muslims)一样,被通称为「边缘性穆斯林族群」的现象。¹因此,这也可以看出卡力岗现象对于中国回-穆斯林多元且复杂的族群现象的整体观察研究,确实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案例。此外,笔者在2010年三、四月间在化隆县与循化县境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大多不太喜欢「藏回」这个外加的称谓,而比较能接受「藏语穆斯林」或者是「说藏话的回族」这样的称呼。

整体说来,卡力岗虽然在藏语穆斯林的现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近来年的民族志研究几乎都只以该地区为研究对象,这种「单一例证」式的论述,忽略了其周遭地区中一样具有类似文化-族群现象的存在事实。同时,这种偏差对于中国西北「回」、「藏」族群文化的长期互动关系的研究与观察,以及穆斯林在中国族群化(ethnicization)过程的模式化理解,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因此,对于历史起源论述多样性的厘清,以及扩大民族志案例观察的效应,则是进行相关研究重要的切入点。

二、族群溯源观点下的「昔藏今回论」及其争议

历史上有关安多地区藏语穆斯林现象,或者是伊斯兰在当地发展与藏民关系的记载都非常有限。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多隆(D'Ollone)调查队曾在甘肃南部的藏传佛教重镇拉不楞,记载过当地穆斯林的信仰文化受到藏传佛教影响与制约的情况,像是喇嘛不允许穆斯林公开进行伊斯兰的礼拜仪式,以及当地唯一的清真寺的外观几乎不具有任何伊斯兰的风格。尽管如此,相较于当地信仰现象混乱的汉人,喇嘛对于信奉伊斯兰一神教的穆斯林反而视为更值得尊重的族群。²此外,民国初年有关清代西北穆斯林抗清运动的研究中,亦有人提到这样的传说,即十八世纪末乾隆年间一位有学问和威望的苏非派(Sufism Orders)领袖「马筛海」(Shaykh Ma,按应该是指虎夫耶花寺门宦的创建者马来迟)曾在青海当地劝说「西番」(按应指现在撒拉族的先民)改宗伊斯兰,同时也让原本不穿裤子的西番从此开始穿上裤子。³这些早期的中外记载虽然让我们窥见到历史上伊斯兰在安多藏区发展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却很难为观察当代的藏语穆斯林现象,提供出有意义的历史发展脉络。

上世纪五〇年代以后,由于民族政策的需要,大陆政府推动民族识别之后所整理出来的调查资料中,在青海化隆县的部份曾提到境内有一群回-穆斯林,其先民为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乾隆年间因受到来自河州(今甘肃临夏)花寺门宦的「马筛海」(即前一段提到的马来迟)到该地传教的结果而改信伊斯兰。在调查当时,这些回-穆斯林在语言上、服饰上还保留着藏民的特点,同时在其住处还挖出了当时埋下的藏传佛教的经书。⁴此外,上世纪九〇年代初化隆县编纂县志时,在该县「民族」的记载中,也提到境内的卡力岗山区仍有一群数目约万余人、身份为回族但仍保有藏文化特征的藏语穆斯林。由于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类官书中都把化隆县历史上藏民改信伊斯兰的动机归因于反抗当地「佛教上层势力的压迫」。⁵然而,这种简短且片段的描述仍无法将化隆县的藏语穆斯林现象有系统地予以呈现。不过,自上世纪八〇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大陆的学者,尤其是青海当地的研究者,便注意到以卡力岗为核心的藏语穆斯林现象。

¹ 张中复,〈「华夷兼蓄」下的边缘游移—论当代中国回族民族属性中的「少数民族化问题」〉,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24,2005,页91-114;事实上,类似卡力岗的「藏回」现象,云南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相似的案例,可参看: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25-181、182-216。

² Le Commandant D'Ollone, le Capitaine de Fleurette, le Capitaine Lepage, le Lieutenant de Boyv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Études de A. Vissiere. Notes de E. Blochet. Paris: Ernest Leroux, 1911, pp.233-235.

³ 單化普,〈陝甘劫餘錄〉,《禹貢半月刊》,5(11),1937,頁98。

⁴ 青海省編輯組,《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薩克族社會歷史調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28-29。

⁵ 化隆回族自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化隆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658-659。



之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卡力岗现象持续吸引着青海当地与外地的民族学者与人类学者，他们大多提出以田野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论著，并企图从族群、宗教与文化等角度来诠释藏族穆斯林在族性意义上的多样性。自此，卡力岗现象便成为观察青海当地「回」、「藏」族群文化、族群关系与民族史等议题方面的重要案例之一。

有关上述的讨论，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李耕砚与徐立奎在 1981 年提出的〈伊斯兰教在卡力岗〉一文。¹该文的重点是在强调当地藏语穆斯林的族群属性是「昔藏今回」，也就是延续着前面官书中所提到的其先民原本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后来因改信伊斯兰而成为回民的传统说法。文中的论点虽然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却记载着不少当地藏语穆斯林仍然保有明显的藏文化特征的民族志数据。除语言外，尚包括明显反映在饮食、生活习惯、建筑风格、婚嫁仪式等方面的「藏式」内容。不过，该文中也强调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昔藏今回」的族群属性在当地群众之中是一种世代相传、并相当具有共识的看法。可是，两年后藏族学者才旦也针对卡力岗现象发表了一篇名为〈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说是回族吗？〉的文章，²来反驳李耕砚与徐立奎文中「昔藏今回」的论点。在他看来，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自古至今就是藏民，即使在宗教信仰上已改宗伊斯兰，但就「民族」的身份而言其应该还是属于法定的「藏族」，因为「民族」的身份是不能随着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改变。

严格说来，这两篇文章争论的焦点，是在于「民族」这个在理解当代中国族群现象时看似定型、但又具有实质争议的概念，当用来界定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这种族群文化特质与我群认同均呈现多样性面貌的群体现象时，必须只能以国家所赋予的「回族」或「藏族」这样的「单一归属」身份来将之定位。因为在中国的民族版图中，是没有「回藏」或者是「藏回」这样的「民族」。事实上，国外学界观察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时，一般很少全盘接受五十六个「民族」的基本论述，因此往往造成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在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之余，最后仍成为「各自表述」的特殊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从研究回—穆斯林这种族群身份与认同意识相当复杂的群体的问题上得到证明。就像 Jonathan N. Lipman 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法定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民族」(minzu) 只是一种人为的范式 (paradigm)。他甚至批评大陆政府与学界对于「民族」的定义及其依此对人群进行族属界分的结果是一种强制性的僵化 (Procrustean rigidity)，所以他不但愿使用「回族」这个当代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诠释、论述从古至今所有关于回—穆斯林的现象，甚至还以族裔分化 (hyphenated) 的概念创造出像「华夏穆斯林」(Sino-Muslims) 这类的特殊词汇来取代争议性的「回族」。³然而，除了学理依据之外，李耕砚、徐立奎与才旦的两篇立论迥异的文章，其背后还可看到族群情感可能产生的效应。身为藏族学者的才旦，希望藉由「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的切割，将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继续保留在「藏族」的当代范畴里。这种情况，与四川西北部的「白马藏人」的问题颇为类似。

上世纪五〇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识别将族源与文化型态与藏民迥然不同的白马人错误地划入「藏族」的范围之中，因而出现「白马藏人」这个在称谓上与族属上均十分暧昧的人群。至上世纪七〇年代末，「白马藏人」企图脱离政府认定的「藏族」的阵容并希望成为第五十六个被政府所承认的少数民族—「氏族」，⁴其结果是引起大陆政府中藏族的上层领导人（据说是第十辈班

¹ 李耕砚、徐立奎，〈伊斯兰教在卡力岗—關於卡力崗地區部份群眾昔藏今回的調查〉，收入：甘肅省民族研究所編，《伊斯兰教在中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417-426。

² 才旦，〈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說是回族嗎？—「卡力崗地區部份群眾昔藏今回的調查」一文質疑〉，《青海民族研究》，1983 (3)，頁 124-128。

³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xx-xxv; "Hyphenated Chinese: Sino-Muslim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in Gail Hershatter etc. ed.,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7-99.

⁴ 有关这方面的调查报告与讨论，可参考：《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1987。



禅)的反对而最终胎死腹中。虽然「白马藏人」与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案例不尽相同,但其都反映出—个值得注意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在青藏高原东部,界于汉、藏、穆斯林三大群体及其地里生存空间之中,仍有一些形式上已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但其族群文化特点、历史记忆、我群认同意识并不与当代中国政府民族识别的结果,及其所被赋予的「民族」身份相契合。他们的族群特征或是「族群范式」(如 J. Lipman 所言)的定位是正处在—种「以小搏大」适应挑战中。其过程无论是从族群接触互动模式中融合(fusion)概念下的混合(amalgamation)、融入(incorporation),还是分裂(fission)概念下的分离(division)、衍生(proliferation)等,¹最终还是会在政治利益的考虑下被迫归属在「单一民族」的范畴之内。第十辈班禅不愿见到「白马藏人」脱离「藏族」的大家庭,他所顾虑的是像这样的例子—旦出现,其所引发的骨牌效应势必会使—般认知下的藏人的势力范围受到冲击而减弱。所以就藏人自身的政治观点而言,「白马藏人」虽然是异己观(image of others)观点下的异类,但其不可能在「另立门户」的情况下自「藏族」中任其出走。然而,藏族学者才旦与第十辈班禅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或许是一致的,他不希望「传统的」藏民的版图因为伊斯兰在安多的传播而被回—穆斯林的势力所渗透,并让这个结果在「民族」的当代意义下出现「脱藏入回」的合理性。但是,不断出现的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民族志研究却提醒我们,他们是历史上回—穆斯林势力在安多扩充下所衍生出来的新成员,同时在当代中国的民族识别所型塑出来的人为界定中,也不会出现被再识别后又再度归属为「藏族」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尤其是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特质与「族群范式」是呈现出相当紧密的结合关系。同时,伊斯兰在族群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凝聚力,以及维系族群边界以强化自我认同的社会功能,有时是比藏传佛教还要来得有效。因此,从族群溯源的观点看来,「昔藏今回」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当代解释还是有许多的讨论空间,但是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却已在当代回—穆斯林的「族群范式」中,找到了族群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定位和归属意识。相较于命运截然不同的「白马藏人」,他们的「族群范式」似乎只能在「藏族」与「非藏族」之间继续摆荡。

三、卡力岗「回—藏」文化模式的区域多样性及其意义

严格说来,卡力岗现象虽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其受到学界有系统的关注则不到三十年。自上世纪九〇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由于—批年轻且接受较为完整的民族学与人类学训练的研究者的投入,让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文化与社会现象,逐渐成为关注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发展机制问题中的—个焦点案例。²从他们长期田野调查与严谨的民族志书写中,配合上世纪八〇年代以来的调查研究成果,让近三十年卡力岗的现象中有关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同等议题,基本上勾勒出—个具有持续性与动态观察意义的发展轮廓。不过,2010年三、四月间笔者在卡力岗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研究论文的重点虽然都集中在卡力岗(有的甚至只是集中在德恒隆乡的若干村落)³,但在整体论述的问题意识中还是会发现某些的争议性现象,例如:—、过度凸显卡力岗在安多地区藏语穆斯林现象中的单一重要性。这种孤证式的研究结论,忽略了卡力岗周边邻近地区、包括循化县境内的回—穆斯林与撒拉族中—样也存在着十分类似的

¹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64-65.

²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马海云与高桥健太郎、丁明俊等人的研究外,还包括:马秀梅,〈青海化隆操藏语回族调查〉,《青海民族研究》,1994(2),页47-51;刘夏蓓,〈—个特殊回族群体的人类学调查:以卡力岗两个回族村为例〉,《回族研究》,2004(4),页71-76;〈论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与变迁防御层次〉,《暨南学报》,2007(2),页148-152;马伟华,〈青海卡力岗回族文化习俗传承与变迁的考察: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村为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3),页21-25;〈青海卡力岗回族宗教认同的调查与思考:以青海化隆县德恒隆乡德—村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9(6),2009,页25-28;马宏武,〈信仰变异与民族特征:卡力岗回族民族特征浅议〉,《青海民族研究》,2002(4),页29-33;沈玉萍,〈卡力岗现象分析〉,收入:马平主编,《人类学视野中的回族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07-122。

³ 例如刘夏蓓与马伟华的田野重点都以德恒隆乡的德—村为主。



案例的事实。二、部份研究以使用藏语来做为保有藏文化模式的最重要的表征，其固然是理解藏语穆斯林现象时最为直接的认知标准，但在族群关系多样性的前提下，语言的使用情境是相当多样性的，这种过度强调说藏语的「身份」所代表的文化一族群观，往往会让将卡力岗及其周边地区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同等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意义，产生「见树不见林」的观察困境。

所以，针对以上这两个带有局限性的研究取向，可以得知：唯有回归到较为完整的民族志研究视野，同时不拘泥于部分文化表象所代表的片断性解读，才能将卡力岗等案例研究中的现代性内容予以有意义地的呈现。首先，从族群溯源的观点看来，安多境内的藏语穆斯林的历史根源应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本其身份是藏民，后来因为伊斯兰的传入而皈依为穆斯林，但在语言上仍然使用藏语，甚至在上世纪后期还明显保有藏民的服饰、建筑与民俗等方面的文化遗留特点。在笔者田野调查的地点中，德恒隆乡的德一村、黄吾具村，群科镇的群科村等地以回-穆斯林自称的人应该是这类典型的例子。虽然说体质外观并不能成为认定族群身份的特定标准，但依据笔者在西北民族地区田野的经验，德一村等这种「昔藏今回」的穆斯林，其形貌确实与藏人的「印象」十分契合。

除了德一村等这种「昔藏今回」的类型外，藏语穆斯林应该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起源，那就是早期外来回民移居到卡力岗等地区，为适应生存与发展生计，必需具备使用藏语的能力，因此发展出以藏语做为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文化现象。后来随着人口流动，形成所谓「藏民走了，但语言却留下来」的结果。近代以来，安多东部穆斯林迁移入藏区的过程，与明、清以来西北地区整体的历史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马海云与高桥健太郎的研究中更直接指出，应该以西宁与临夏来做为观察卡力岗人文历史背景的重要依据。¹事实上，清末以来西北穆斯林抗清运动所引发的时代动荡，往往不仅会激化族群关系的紧张对立，同时也会引发非穆斯林被迫改宗伊斯兰而成为穆斯林的案例。这种例子在回、汉的族群互动中较容易找到，但在藏、回的族群互动中较为罕见。²因此，无论从历史文献或是当代的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确定的是，历史上卡力岗等地区的藏民改宗伊斯兰的过程与西北穆斯林抗清运动并无太大的关连。但相关人群流动、接触或迁徙可能造成族群边缘及其认同改变的情况，则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群科镇的格尔麻村与甘都镇的唐寺岗村等聚落，都是这类「藏民走了，但语言却留下来」传说中例子。其中唐寺岗村的穆斯林还有不少是从循化迁徙来的撒拉族人，因此撒拉语也成为当地另一种内部的沟通语言。在格尔麻村的访谈中，包括清真寺阿訇在内的部份当地耆老，都非常强调其祖源为穆斯林而非藏民。这种案例，刘夏蓓在德恒隆调查报告中提到的说汉语的纳加村穆斯林，其型态也应归属为此一类别。³不过，格尔麻村的当地的年轻干部却不认为其先民为外来移入的穆斯林，反而十分肯定「昔藏今回」的说法，因此出现一个村落两种祖源的解释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认为其先祖为穆斯林或是藏民，这可能与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婚姻关系的认知有关。前面曾提到早在上世纪初法国多隆调查队曾在拉不楞的记载中就提到当地的穆斯林很多都是娶藏人为妻。⁴在当代的民族志资料中也多次提及卡力岗、循化的藏语穆斯林早期有与周边的藏人女子通婚，并且都让她们改信伊斯兰。而在德恒隆调查报告中提到，即使周边有的村庄以说汉语的穆斯林为主，但藏语穆斯林仍以说藏语的女子为主要的婚姻选择对象。⁵因此，在卡力岗现象中，不少案例是藉由与藏族女子的婚姻关系、并透过宗教皈依来扩大

¹ 马海云、高桥健太郎，〈伊斯兰教在藏区：卡日刚穆斯林研究〉，页 302。

² 例如笔者在上世纪九〇年代末于甘肃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唐汪乡姓唐的回族穆斯林有承认其祖先原本是汉族，后来因为被迫参与西北穆斯林抗清运动，所以才改信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穆斯林。

³ 刘夏蓓，〈一个特殊回族群体的人类学调查：以卡力岗两个回族村为例〉，页 72。

⁴ Le Commandant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p.236.

⁵ 马秀梅，〈青海化隆操藏语回族调查〉，页 48；马伟华，〈青海卡力岗回族文化习俗传承与变迁的考察：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页 23。



藏语穆斯林的社会成员。同时，以会说藏语的穆斯林做为优先婚配的考虑，这多少也对于强化藏语穆斯林社群意识有所帮助。

然而，卡力岗、循化等地的藏语穆斯林的语言使用情境却是比想象中要来得复杂。当地穆斯林（包括具回族、撒拉族法定身份者）的聚落被归类为：说藏语为主的回—穆斯林村、说汉语为主的回—穆斯林村、说藏语为主的撒拉族穆斯林与回—穆斯林杂居村（汉、藏、撒拉族三种语言混用）、以及说汉语为主的藏、回—穆斯林杂居村等多种型态。除此之外，尚有一定数量的纯藏族村交错分布在这些穆斯林村落中。¹虽在这种田野分类还是有些模糊与不确定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群之间语言使用的方式与选择性会出现更为多样性的事实，但当地人似乎也很自然地以「说 XX 语」来做为卡力岗地区村落区别中的一种标记。²此外，田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所谓的「单独说藏语」村落或「混合说藏语」村落的藏语穆斯林，说藏语不仅是世代相传并落实生活习惯的一种社会表征，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我群意识的情感表达。这种社会功能，似乎与 Dru C. Gladney 在观察中国少数民族的当代族性再现（representation）时所提出的人为认同（marking identity）现象颇为类似。³

四、历史记忆与伊斯兰宗派意识的形塑

如果要从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研究角度来观察卡力岗现象，其似乎欠缺科玛洛夫夫妇（John and Jean Comaroff）所强调系统文献或文本做为研究开端的重要性。⁴但是，如果从他们主张以历史情境与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来与民族志书写产生必要互动的观点看来，伊斯兰宗派意识及其传说对于卡力岗现象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而言，其所具备的特殊解释意义与族群文化形塑内容都是不容忽略的部分。从当代民族志研究中可以发现，伊斯兰的宗教实践及其信仰体系所形成的群己意识，很明显地已成为观察卡力岗藏语穆斯林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等问题时最为关键的背景因素。然而，由于近代以来伊斯兰在中国西北穆斯林社会中的发展过程，一直受到包括传统的苏非派与新兴的现代改革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伊斯兰派别思想的渗透，其在地化与体系化的结果不仅形成宗派多元化的事实，同时也导致复杂的社会分化现象的出现。这种宗教在社会化与世俗化历程中所产生的特殊适应结果，让西北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穆斯林社会，在整个中国伊斯兰的境域中成为一个相当特殊的发展案例。所以，这也使得研究卡力岗现象中的伊斯兰议题，必需纳入到西北穆斯林社会的特有情境中去观察与理解，而不能从西北以外其他中国伊斯兰的案例来加以比对或附会。

伊斯兰在卡力岗的发展，尤其是让当地藏民皈依为穆斯林的历史脉络，一直欠缺着有系统的史料纪载的左证。前文中提到，自民国初年以来西北地区已流传着清代乾隆年间河州（临夏）虎夫耶花寺门宦的创建者马来迟到卡力岗传教的说法，似乎已成为卡力岗地区伊斯兰化的唯一依据。如同前面曾提到的有关卡力岗的田野研究数据的记载一样，在德一村的德恒隆清真寺附近的耆老家中，笔者也见到马来迟到当地传教时留下来的手杖，上面还刻有他的阿拉伯语的名字。近年来，中国大陆民族学界与历史学界开始注意卡力岗现象的研究，不少著作中都提到这支的马来迟传教手杖及其所象征的代表意义。虽然目前卡力岗地区伊斯兰的教派（sects）现象是以属于新兴的现代改革主义系统的依赫瓦尼（*Ikhwan* 一般称为新教）为主，而非原来可能存在的苏非派门宦或格底木（即是传统伊斯兰，它与苏非派门宦一般都被称为老教），但德恒隆的宗教知识人都以马来迟的传教凭证（手杖），以及他曾在当地显灵式的民间传闻——「克拉迈提」（*Kramat*,

¹ 刘夏蓓，〈论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与变迁防御层次〉，页 149。

² 例如笔者与沙连堡乡的书记逐一讨论卡力岗地区所有行政村与自然村的「语言特征」时，他几乎很笃定的顺序点出「XX 村绝对是说 XX 话」这样的结论。

³ Gladney, *Dislocating China*. p. 51.

⁴ John and Jean Comaroff,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4-35.



magic, 神迹), 来做为早期伊斯兰在卡力岗藏区得到确切发展的历史证明。通过这次调查, 笔者亦发现这类定型化的历史记忆, 会经由当地相关报导人十分熟稔的论述方式, 向外来的研究者进行有系统的论述, 成为一种当代意识投射下的「历史再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然而, 马来迟的传说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意义, 但是其毕竟只是卡力岗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点」或「线」, 而不能视为「面」的发展脉络。曾有熟悉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指出, 如果忽略临夏的伊斯兰的对外发展关系, 一直是卡力岗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社会动力来源的事实, 就直接把马来迟的传说与当地藏民皈依为穆斯林的过程渊源划上等号, 那不仅是歪曲了历史, 而且也与现实脱节。¹事实上, 卡力岗地区伊斯兰化过程中的重要发展脉络, 不仅只是历史上境外穆斯林的移入与当地藏民的宗教皈依, 以及后来回族身份的确定而已, 其中更牵涉到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派多元化的现象。

虽然苏非派门宦或格底木等教派现象在早期卡力岗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可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 但近代以来该地区的伊斯兰发展过程却是深深受到新教系统的依赫瓦尼的影响与型塑。按依赫瓦尼此一新兴宗派, 基本上被归属为具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本质的现代改革主义。自上世纪初期开始, 其就以「尊经革俗」等理念为主的改革思想,²向苏非派门宦与格底木的传统社群进行传教。由于依赫瓦尼强调以《古兰经》等经典的基本教义为信仰与生活实践的唯一依循标准, 并以宗教改革者的角色反对汉文化与相关民俗现象的渗透(如拿香祭拜), 以及苏非派门宦中对于筛赫(Shaykh, 教主)及其坟墓(或称拱北)的崇拜等「异端行为」。而这种教义单纯、且主张从宗教「净化」过程来巩固信仰本质的思想, 很容易在西北封闭的社会中发挥扩散效应。加上民国时期以来马家军阀在青海当地「独树一帜」式的大力推展, 让依赫瓦尼自民国以来便成为西北地区发展最为快速的伊斯兰宗派。³因此, 新兴的依赫瓦尼及其宗教、社会的规范性力量, 对于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文化与族群观是否也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制约效应, 则是值得深入观察的。虽然上世纪中叶中共建政初期, 伊斯兰在西北地区受到很大的压制与破坏, 但「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不同程度的宗教复振现象让依赫瓦尼在卡力岗的发展更成为定型化的趋势。例如笔者在当地遇见的阿訇们几乎都曾在临夏几所重要的依赫瓦尼清真寺, 如大西关寺、铁家寺等学过经的。在浓厚且保守的宗教氛围固与严谨的生活实践下, 他们对于依赫瓦尼所代表的「新教」的教派意识是相当地坚持。德恒隆清真寺的阿訇甚至不允许他的教民们看电视, 因为现代电视节目太多不当的内容与伊斯兰的教义相违背, 都是必须禁止的「哈拉姆」(haram, unlawful, 非清真的不洁之物)。

因此, 除了藏语之外, 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藏文化习俗在近几十年当中明显地走向消亡, 这其中是否与当地不断强化的依赫瓦尼信仰, 及其「尊经革俗」的传统精神及其社会实践有关, 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然而,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 从过去到现在卡力岗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 基本上与当地原有的藏传佛教之间,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综摄(syncretism)现象。虽然包括语言在内的藏文化形式与 Muslim 的宗教生活结合在一起, 可是长久以来却没有影响到伊斯兰的信仰体系与宗教本质, 同时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反宗教综摄(anti-syncretism)的情结。⁴相反地, 伊斯兰化的过程却让部份卡力岗的藏民皈依为穆斯林。即使我们会在黄吾具村中相当古老的清真寺中看到藏式风格的装饰, 或者是类似的藏文化渗透现象与穆斯林的宗教表征现象并存, 但无论是说藏语或是汉语的穆斯林, 其具体的宗教实践确实是与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之间保持着相

¹ 马海云、高桥健太郎, 〈伊斯兰教在藏区: 卡日刚穆斯林研究〉, 页 305。

²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pp. 205-206

³ 依赫瓦尼于 1930 年代初期因教义解释的差异而出现内部矛盾, 最后导致主张遵行更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赛莱菲也(Salafiyya)派于 1937 年自依赫瓦尼中分裂出来。直至今日, 赛莱菲也与依赫瓦尼之间的对立意识仍然十分明显。相关历史背景与解释可参考: 马通,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页 147-154。

⁴ Rosalind Shaw and Charles Steward, "Introduction: problemizing syncretism", in Charles Steward and Rosalind Shaw ed., *Syncretism/Anti-Syncretis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Syncreti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27.



当清楚的区隔。此外，田野中也发现，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都不会读藏文，从他们坚定的宗教归属与生计的需求中也几乎看不到有必须会读懂藏文的必要性。

然而，真正让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之中没有出现伊斯兰与藏传佛教之间宗教综摄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依赫瓦尼教义解释中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前文中提到，依赫瓦尼传教过程中基于「遵经革俗」的理念，对于苏非派门宦与格底木老教的主要批判就是在于汉文化渗透等涉及信仰行为的「异端行为」现象。可是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虽然也有明显的藏文化遗留，但这种象征族源特色与社会适应的内容，显然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意识，所以并不会直接被视为「异端行为」。而另一方面，依赫瓦尼教义中明显对于宗教世俗化中违背伊斯兰本质的排他性思想，相对地也阻止着藏文化对于伊斯兰宗教教义的渗透。因此可以看出，身份尊贵的马来迟的传说为卡力岗地区伊斯兰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接近于史实」的起源脉络，但随后定型化的依赫瓦尼却让藏文化形式只保存在具有当地认同功能的生活形态及其表向意义中。这种以宗帕特性归属为中心的宗教认同，加上近半个世纪以民族身份的单一认定与选择性，都使得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在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中，依然坚持回一与穆斯林「民族」意涵下的族群认同边界。换句话说，这种宗教认同带动下的社会与族群认同意识，其自称无论是藏语穆斯林或说藏语的回族，这种特有且多样性的我群—他群观，其呈现内涵很明显地是受到以下这两种情境互动下的结果，一、当地历史上传统「回」、「藏」族群属性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根基认同 (primordial identity)；二、大陆政府民族识别政策中确定回族、藏族等这种族国 (nation-state) 型塑之下的当代少数民族身份的「再认同」意识。这也就是说，在此一互动下，透过依赫瓦尼宗教属性的强化功能，这种「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定结果，会让「过去」的回—藏分野或异群观的认同争议在当代找到了合理的定位意义。这一点，确实是研究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现象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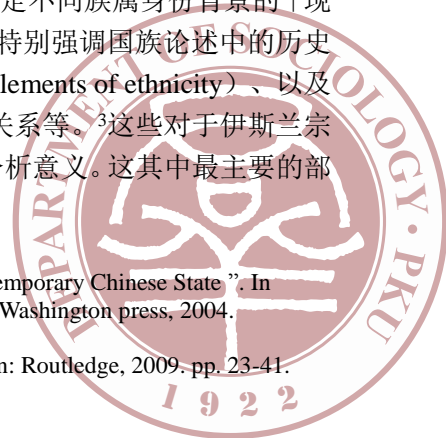
五、族群溯源、异群观与当代「民族」身份的互动关系

透过上述的分析，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对于观察当代回族族群属性的多样性及其争议确实提出有意义的讨论方向。按当代民族识别下的回族及其法定少数民族身份的正当性在中国大陆穆斯林学者眼中是没有争议的，但其却一直被西方学界所质疑。这其中的关键即在于中国国族主义所形塑下的族国体制及其民族版图中，说汉语的回—穆斯林人群被直接归属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同时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种非华夏属性的历史情境可以一直上溯到伊斯兰传入中土之始。杜磊就很直接地指出回族的身份基本上便是多数国族主义 (majority nationalism) 刻意操弄下的结果。¹前面提到对于民族识别持否定态度的李普曼，也认为回族的民族身份被强制依附在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虚拟情境中。²换句话说，由于回族内部因地缘分布所产生的复杂性，及其与伊斯兰宗教纽带关系的亲疏不一，因此在国族主义展现族国范式中的少数民族身份及其认同模式便显现得过于模糊与不确定。如果从英国后现代国族主义研究者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所强调的族群表征论 (ethno-symbolism)，似乎可以用来反映出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信仰本质对于民国时期的回—穆斯林或当代回族，其在国族主义族群观界定不同族属身份背景的「现代国民」过程中的模式化意义。在史密斯界定族群表征论的定义时，特别强调国族论述中的历史性 (the historicity of nations)、族群意涵中的表征性要素 (symbolic elements of ethnicity)、以及国族的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ation) 及其与历史意识建构的关系等。³这些对于伊斯兰宗教文化与回—穆斯林族群性形塑的互动过程都具备着一定的解释与分析意义。这其中最主要的部

¹ Gladney, "Clashed Civilization?", pp.114-118.

² Jonathan N. Lipman, "White Hats, Oil Cakes, and Common Blood: The Hui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 In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pp.28-29.

³ Anthony D. Smith,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3-41.



分在于，史密斯认为国族主义的出现与族国的建立其基本内涵应是现代建构论（modernism）的结果，而不是以往论述中的传统延续论（perennialism）的衍生。就此而论，以伊斯兰文化与穆斯林我群意识的结合基础上，让回族族群性的表征特点在国族主义与法定少数民族身份的标签化过程中，重新产生（或建构出）族群溯源意义下的当代认同标准。而此一标准甚至于还成为所有关于回族穆斯林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共同历史记忆与当代「民族」脉络相连接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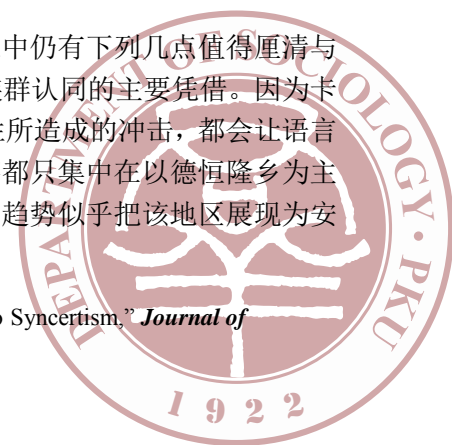
因此，如果将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伊斯兰宗教属性、藏语为中心的文化展现及其当代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意识均受到当代国族主义形塑的影响及其事实，放在史密斯的族群表征论中加以理解，则会发现这种特别的边缘性穆斯林人群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异群观的建构，即使面对族群溯源的回、藏多样性，也不致于出现其当代民族认同的「身份」会摆荡在「回族」或「藏族」的二分法之中，而直接会以「回族」这个当代建构性意涵甚为明显的族属范畴为依归。这种结果，在其他边缘性穆斯林人群中也呈现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单是卡力岗藏语穆斯林这类边缘性穆斯林人群与其周遭强势「异类」社会之间会产生身份认同的游移，或最终仍以国家赋予的法定少数民族身份为面对族群关系多样性过程中坚持我群边缘意识的凭借，广大说汉语的回族其内部亦容易出现这种与汉族之间身份认同的暧昧性。这其中尤其是当伊斯兰的宗教实践及其穆斯林意识仅以回族的名义来做为脆弱性的维系准绳时最为明显。这一方面，以色列学者伊思利（Raphael Israeli）对于宗教文化凝聚穆斯林族群性以及在本土化的过程，提出了「穆斯林的汉化」（Muslim Sinicizing）与「中国的伊斯兰化」（Chinese Islamizing）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做为解释的基础。¹这种研究取向固然有其历史观察的意义，但对于近代国族主义论述下的族类意识的凝聚与建构现象，似乎还欠缺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不能忽略的是，藉由此一取向的解读，在族群溯源观点下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文化体质，亦包含「穆斯林的藏化」（Muslim Tibetanizing）与「藏人的伊斯兰化」（Tibetan Islamizing）这两种不同的互动意义。然而，当代的回族身份的强势赋予，让卡力岗藏语穆斯林在回民与藏民的传统二元身份中更明显向「回」的范畴游移。而前述一世纪以来依赫瓦尼新教的宗教改革与原教旨主义深入人心的宗教归属意识，更让藏文化仅仅局限在生活语言的层次且无法产生宗教情境的选择性，这都使得卡力岗藏语穆斯林今后持续成为「回族」成员之一的因素不断予以强化。

结 论

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现象是观察安多地区的回、藏族群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案例。近年来，随着部份以实证研究为重点的民族志论述相继出现，让卡力岗现象在文化变迁、社会适应与族群认同等相关议题上得到较为深入的理解。就族群溯源的角度而言，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的来源，有可能是原来当地的藏民在伊斯兰化过程中皈依为穆斯林，并且保留了包括藏语在内的部份藏文化习俗，形成所谓的「昔藏今回」的现象。而另一种类型，则是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也有原本就是以回民的身份进入卡力岗藏区，但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因适应需要而逐渐「藏化」的穆斯林。

不过，从当代田野民族志的视野看来，卡力岗的藏语穆斯林现象中仍有以下几点值得厘清与重视，其一、是不宜过度用「说藏语」的文化表征现象来做为观察族群认同的主要凭借。因为卡力岗的族群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以及现代化的影响对于传统封闭性所造成的冲击，都会让语言的使用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意义。其二、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观察都只集中在以德恒隆乡为主的卡力岗地区。虽然卡力岗地区确实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研究趋势似乎把该地区展现为安

¹ Raphael Israeli, "Established Islam and Marginal Islam in China from Eclecticism to Syncert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 21: 1 (1978), p. 99.



多境内藏语穆斯林现象中的单一例证，这反而忽略卡力岗邻近地区（包括循化县）都普遍存在着相同的事实案例。因为无论从近代西北穆斯林的社会发展历史，还是当代族群人口的迁徙与互动的过程看来，若要有效地研究观察此一现象，则必须建立跨区域的、多种样式的研究类型与观察模式，而不宜以单一的「卡力岗案例」来做为整体性的呈现意义。其三、卡力岗地区以宗派现象变迁为主的伊斯兰化过程，以及近代占主导地位的依赫瓦尼现代改革主义思想对于社会文化中「异端行为」所产生的制约效应，使得部份藏文化的生活模式不会与穆斯林的信仰本质产生冲突，同时也让伊斯兰与藏传佛教在当地并没有产生任何形式的宗教综摄和反宗教综摄现象。而这种结合历史记忆与宗派归属的认同机制，让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身份特性，一直定位在一般认知下的回-穆斯林的范畴之中。其四、更重要的是，藉由中国大陆政府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识别的政策主导，传统的回民与藏民的族群边界及其族群认同都被具有国家体制与法律意义的「回族」与「藏族」所取代。这种定形化的区隔模式，让族源与文化属性多元的卡力岗藏语穆斯林，反而更能在原本穆斯林意识的基础上「定位」于当代回族或撒拉族的民族范式之中。这种情况，也使得藏语等藏文化现象能够合理地与伊斯兰文化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并存效应，而不致于产生族籍归属问题的争议。

引用书目：

- 丁明俊, 2006, 《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才旦, 1983, 〈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说是回族吗? —「卡力岗地区部份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 《青海民族研究》, 1983 (3), 页 124-128。
- 化隆回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4, 《化隆县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 1980, 《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成都: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编), 1987, 《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 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
- 李耕砚、徐立奎, 1982, 〈伊斯兰在卡力岗—关于卡力岗地区部份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 收入: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 《伊斯兰教在中国》,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页 417-426。
- 吴承义, 1990, 〈康杨回族乡沙里木回族讲土语及其由来的调查报告〉, 《青海民族研究》, 1990(4), 页 50-54。
- 沈玉萍, 2004, 〈卡力岗现象分析〉, 收入: 马平主编, 《人类学视野中的回族社会》,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页 107-122。
- 青海省编辑组(编), 1985, 《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 马海云、高桥健太郎, 2003, 〈伊斯兰教在藏区: 卡日刚穆斯林研究〉, 收入: 中国回族学会编, 《回族学与 21 世纪中国》,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页 291-312。
- 马宏武, 2002, 〈信仰变异与民族特征: 卡力岗回族民族特征浅议〉, 《青海民族研究》, 2002 (4), 页 29-33。
- 马秀梅, 1994, 〈青海化隆操藏语回族调查〉, 《青海民族研究》, 1994 (2), 页 47-51。
- 马伟华, 2008, 〈青海卡力岗回族文化习俗传承与变迁的考察: 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8 (3), 页 21-25。
- 马伟华, 2009, 〈青海卡力岗回族宗教认同的调查与思考: 以青海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9 (6), 页 25-28。
- 马通, 1983,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张中复, 2005, 〈「华夷兼蓄」下的边缘游移—论当代中国回族民族属性中的「少数民族化问题」〉, 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 24, 页 91-114。
- 单化普, 1937, 〈陕甘劫余录〉, 《禹贡半月刊》, 5 (11), 页 98。
- 刘夏蓓, 2004, 〈一个特殊回族群体的人类学调查: 以卡力岗两个回族村为例〉, 《回族研究》, 2004 (4), 页 71-76。
- 刘夏蓓, 2007, 〈论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与变迁防御层次〉, 《暨南学报》, 2007 (2), 页 148-152。



- Comaroff, John and Jean.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D'Ollone, Le Commandant le Capitaine de Fleurette, le Capitaine Lepage, le Lieutenant de Boyve. 1911,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 Études de A. Vissiere. Notes de E. Blochet. Paris: Ernest Leroux,.
- Gladney, Dru. C. 1992,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adney, Dru. C. 1998, "Clashed Civilization? Musli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the PRC". In Dru C.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6-131.
- Gladney, Dru. C. 2004,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sraeli, Raphael "Established Islam and Marginal Islam in China from Eclecticism to Sincert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 21: 1, pp. 99-109.
- Lipman, Jonathan N. 1996, "Hyphenated Chinese: Sino-Muslim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in Gail Hershatter et al. ed.,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7-99.
- Lipman, Jonathan N. 1997,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ipman, Jonathan N. 2004, "White Hats, Oil Cakes, and Common Blood: The Hui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 In Morris Rossabi ed.,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pp.19-52.
- Shaw, Rosalind and Charles Steward, 1994, "Introduction: problemizing syncretism", in Charles Steward and Rosalind Shaw ed., *Syncretism/Anti-Syncretism: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Syncretism*. London: Routledge, pp. 1-27.
- Smith, Anthony D. 2009,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外刊书评】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1995-2012）

Asian Ethnicity, 2013, Vol.14, No. 1, pp. 132-135¹

詹姆斯 雷博德 (James Leibold)², 阳妙艳译³

近年来, 华语界对于族群、种族和国家认同, 也即在中国通常 (且令人困惑地) 被称为 “民族” 的研究成倍增长。作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一部分, 与国际社会的双向学术交流大大提高了中文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实证的精细度, 尤其是对于中国超过 1 亿人口的少数民族研究更是如此。为了保持与最新研究同步, 西方学者们习惯于经常性去浏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旗舰刊物《民族研究》, 或其他隶属于民族院校系统 (比如中央民族大学) 的学术刊物。多样化的媒体和学术窗口以及新通信技术的发展, 催生了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路径。

在中国的族群研究领域, 时常被一些人忽视但应当被视为最重要资料来源之一的是由北京大

¹ 网上下载英文 PDF 版本: <http://dx.doi.org/10.1080/14631369.2012.745741>

² 作者 Prof. James Leibold,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电邮地址: J.Leibold@latrobe.edu.au

³ 译者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

